

甘肃回族源流考略

高 占 福

回回民族自明代逐渐形成一个人们共同体以来，甘肃一直是其主要的聚居区。在此以前，也曾是回族的“先民”们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今天在甘肃境内居住的回族，共有950,974人（1982年统计数）仅次于宁夏回族自治区（1,235,207人）而居全国其它各省、市、自治区之首。从甘肃回族的历史发展来看，唐、宋之际，以经商为目的，沿着丝绸之路进入甘肃的大食穆斯林及唐肃宗时援唐后落居甘肃的部分大食兵，是甘肃回族最早的“先民”。南宋末年，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东迁到甘肃的回回人，是甘肃回族的主要来源。明、清以来，特别是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多次向甘肃境内迁居，以及境内回族本身的迁徙活动，基本奠定了今天甘肃回族的居住区。现就以上诸问题作些探索，以供研究中国回族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

我国史学界，一般以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正式派遣使节到中国长安，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据《旧唐书·西戎传》载：“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啖密莫末膩。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这也是“大食”一名第一次在我国史籍中出现。当时大食国的势力，向东已伸展到南起印度河流域，北到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在葱岭以西与唐朝疆域相接。在此以前，唐王朝为了打通与西域诸国的友好通道，于贞观九年（635年）打败了经常威胁河西走廊的吐谷浑，以后又相继打败了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及西突厥，并在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设置了州、县开辟了西域和内地来往的商道，丝绸之路复通。这就为大食国辖境内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及其他身份的人进入甘肃提供了极为方便的交通条件。大食国人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一般以长安为终点。但在河西也有经商或途经时的落居者。

唐代，河西地区是全国著名的富饶之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①因此，大食商人往来河西的，盛于前朝，他们与中国商人互市于河西诸郡，“及其日久，多有留居不去，冠汉姓，娶汉人女子为妻妾者”。^②近人马凡在其《河西的社会环境》一文中也认为“回教

^①《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八月条。

^②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第110页。

在河西的历史颇久。唐代以后由新疆一带进而达河西，河西遂成为回教向东发展的根据地。”^①河西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经济资源，吸引了为数不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在那里经商，或者取道赴长安。他们中的有些人羡慕河西的繁荣和富饶，流寓不归，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实力。甚至发生过西域商人与地方官因矛盾而械斗的事件，“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②说明西域各国在河西经商者，为数已不少。这些商人中的穆斯林，并不带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任务，但他们在经商之地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确是可信的。

唐代，以经商为主要目的的大食国商人，除了在河西活动、留居外，在甘肃的其它地区并不是没有涉足或活动。最近的材料证明，自唐代以来，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有以下几条主要干线，北线：陇东——六盘山——靖远——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安西（瓜州）——敦煌（沙州）——玉门关（或阳关）。中线：六盘山——静宁——会宁——定西——兰州（金城）——武威……或陇坂（陇山）——天水（秦州）——陇西——临洮（狄道）——永靖——武威（以下同北线）。南线：天水——陕西——临洮——临夏（枹罕）——西宁——扁都口（大斗拔谷）——张掖（以下同北线）。^③从以上线路的分布中我们可以得知，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河西虽为总汇之区，但网络状的线路仍为不少。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记载，大食国穆斯林在这些线路沿途经商或途经赴长安的史实，但他们在这些线路上来往或暂时留居，应该说是可以肯定的。据现在的临夏回族自治区八坊地区回族中长期流传下来的口碑资料说：在唐朝时，有来自阿拉伯的十大“上人”（即有一定伊斯兰教学识的贤者），曾在临夏一带活动，亡后葬在位于今天临夏市中心的南关大寺一侧。解放前夕，他们的墓迁到城西近郊处，至今有人到墓前凭吊，并复修了墓地。这有可能是昔日来往于丝绸之路，甘肃境内陇西段之间的大食国商人留居临夏的佐证。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在当时不仅是民间往来的通道，而且也是唐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的主要路线。《旧唐书·波斯国传》记载：“仪凤（高宗）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据《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一百四十八年中，大食国派遣使节到中国约三十多次。波斯派来中国的使节也有二十余次，“他们朝贡的任务大概也不出于商务联络的意义”。^④从他们来华的路线看，大部分是沿“香料之路”抵达东南沿海，而后辗转到长安，其中阿拉伯人居多。波斯人则多从丝绸之路赴长安。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如此繁盛，大食穆斯林商人因种种原因暂住或留居不归者，成为甘肃回族最早的来源之一。

公元七五五年（唐天宝14年），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唐明皇曾向大食国求助平定叛乱。事后，这部分援唐的官

《西北世纪》1949年4卷1期。

《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年条。

《丝绸之路漫记》甘肃分册，“前言”第2页。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10页。

兵，因来中国时的凉鄯大道已为吐蕃所据，加之唐政府答应他们留居中国，遂散居在长安及甘肃南部。自天宝后，史籍中已明确记载伊斯兰教在甘肃传播的情况，“唐天宝后，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①到了唐末，今天甘肃的张掖、武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县，已有回族“先民”居住，“终唐之世，惟甘、凉、灵州有回族”。^②

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同大食人的贸易，在各方面予以方便和优待，“纵令彼等稍有非法，或犯罪行为，亦往往宽恕不问”。因此，大食人来中国的较之唐代更盛。据《宋史·大食传》、《宋会要辑稿》等记载，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二百年间，大食国曾遣使四十九次来中国，一般商人的贸易往来就更多了。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则是一部分使节和商人从陆路来中国的必经之路。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大食国派贡使蒲麻勿陀婆离，副使蒲加心等到中国，是经“沙州（今敦煌县西），涉夏国（时指河西地区），抵秦州（今天水）”^④而转道赴东京（今开封）的。一直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甘肃境内今临洮等地，仍然是大食使节从陆路到中国的要道之一，“绍兴三年十月十五日，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司言：大食国进奉般次，迹令马斤等赍到表章。缘近奉旨，于阗国已发般次，来到熙州（今甘肃临洮）者，表章进奉物，今本司于熙州军资库寄纳。今者大食国乞赴阙进贡，令取朝廷指挥。诏依于阗已降指挥。”^⑤大食人不断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落居甘肃河西地区者，仍不乏其人。如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六月，宋政府曾把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寄居的西域胡人（大食人为主）徙于江南各卫，被徙者达四百三十六户，一千四百七十九口。可见宋时寄居甘肃境内的大食人，已有相当比例。《西湖游览志》就南宋时北方落居大食人南迁江南一事，作了如下的记载：“先是宋室徙跽，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诸如此例，宋代穆斯林之来中国，留居贡道不归者，早在唐、宋已为数甚多。”这里所指的“留居贡道不归者”，不仅仅是指从海路到中国东南沿海留居的穆斯林“蕃客”也同样包括沿丝绸之路这条贡道落居甘肃的穆斯林。即使在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宋朝与大食等国的来往受到一定阻碍的时候，大食人仍然从西域到青唐（今西宁），经秦州（今天水）赴宋都开封。所以说，宋代沿丝绸之路的各条通道经甘肃到中原的大食人，几乎从未间断过。元朝初年，马可波罗到甘州（今张掖）时，发现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唐古忒首府内居住的人中，就有一部分伊斯兰教徒。证明在宋代就有穆斯林居于甘州的事实。

从唐、宋两代大食人同中国通商等往来的历史来看，海路无疑是胜于陆路的。从海路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及长安等地的大食国穆斯林，是回回民族的“先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食穆斯林，他们也是回回民族的“先民”，特别是对西北地区的回族，这部分大食穆斯林，在渊源上更为接近。也可以说，自唐、宋以来，甘肃就是大食等国穆斯林路经和活动、留居的区域之一。因而追溯甘肃

《甘宁青史略》卷首。

《甘宁青史略》副编，卷3。

见《宋史·大食传》。

④ 《宋史·大食传》。

⑤ 《宋会要辑稿》番夷47。

回族的来源，从唐、宋时期开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二

从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至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这四十年中间，蒙古军队曾分别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旭烈兀的指挥下，经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其势力一直伸展到今天的波兰、匈牙利，以及木刺夷（在今伊朗境内）、报达（今巴格达）、阿拉伯等地。这样，蒙古军队便把新疆、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亚细亚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及欧洲东部的各族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蒙古军队在占领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凭其军事力量，强行把大食国和花拉子模统治下的回回军匠、回回工匠、回回炮民、回回平民、回回商人等，迁徙到中国。据《元史译文证补》记载：“太祖（成吉思汗）以康里兵三万，一夜尽杀之，取工匠三万，分予各营。”“讨马鲁，悉诛城民，惟工匠、妇女、童稚得免。”“讨札刺勒丁，令民出城，俘戮之，取工匠从军”。^①这些工匠到了中国后，绝大部分也成为军士，“其东归朝庭，入兵籍”。^②他们都被编入“探马赤军”和“西域亲军”，参加了蒙古贵族灭西夏、金和南宋王朝的战争。在忽必烈统一全中国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就留居各地，从事戍边、屯垦、看守仓库等活动。这部分在甘肃落户的回回人，就成为甘肃回族形成的主要来源。

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从此以后，在甘肃的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在已垦或未垦的荒地上屯聚牧养，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证明了回回军士和回回工匠在甘肃落户屯田耕牧的历史。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政府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和田）、可失合儿（喀什噶尔）工匠千五十户屯田”。^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哈散等，俾种耕之”。^④哈散曾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就职于当时的甘肃省会张掖，利用手中的权力，驱使当地的各民族和回回军士等替他耕种广阔的赐田，必是可能的。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曾下令：“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税银”。^⑤这些史料从一方面可以表明，在忽必烈的时候，河西的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一带，曾有大片旷土由回回人耕种。也就是说从元初开始，已有大量的西域回回军匠、人户在中国各地（甘肃河西最为典型）定居下来，并且开始经营农业生产了。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就元代的屯田，做过这样的论述：“军户屯田遍布全国……探马赤军得地最多。”西征前创建的探马赤军，全部由蒙古精锐所组成，西征后成份有了很大的改变，回回军占主要的比例。众多的回回军随着军事行动散布全国，后就地从事农业生产。落居甘肃的回回军，想必得地亦不少，这就是甘肃回族至今仍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基本历史原因。元代屯田的回回军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22。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24。

《元史·世祖本纪》。

《甘肃通志稿》卷26。

⑤ 《元史·英宗本纪》。

人、工匠在甘肃的落居，是甘肃回族族源最重要的部分。

元代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是甘肃回族形成的另外一个部分。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成宗铁穆耳的从弟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①唐兀之地，据白寿彝先生考证，范围包括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甘肃北部及青海东北部。^②宁夏在元成宗时，设宁夏路总管府，领五州三县，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所以阿难答的十五万军队，大部分驻扎在当时的甘肃境内。关于这十五万人的活动情况，阿难答死后，史籍中似无记载，大概散落民间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这样，在甘肃境内散居的应为多数。

蒙古上层改信伊斯兰教，并非始于阿难答。在此之前，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的第三个儿子伯勒克就是第一个改信伊斯兰教的。《多桑蒙古史》记载：“伯勒克，术赤诸子。兄拔都薨，以伯勒克主国事，信天方教（即伊斯兰教）。常集教士鄂尔多，讲论教律教理。太祖后裔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③所以，阿难答及其大部分士卒信奉伊斯兰教一事是可信的，其在甘肃境内散居后，成为甘肃回族形成的一个来源，也是能成立的。

元代，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中西交通又一次呈现繁荣景象，这时进入甘肃经商或路经甘肃求仕者，也是甘肃回族形成的来源之一。商人的生活多带有流动性质，交通便利是首要条件，元代既有“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④的交通便利条件，西域回回便大量进入中国“多方贾贩”，甘肃境内的回回商人数亦甚众。为此，元政府还专门下令禁止回回人进入中国西部经商，“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禁西北边回回越境为商”。^⑤这些经商者涉足留居范围，在元以前仅限于京师和名城巨邑，此时在中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居住，不受任何限制。甘肃河西地区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该地回回人数不少。在肃州（今酒泉）东关内“自东至西大街一条，长一里半；自南至北横街一条，长一里；其余小市僻巷不一。肆中贩粥，不拘时辰，朝市暮散，富庶与城内埒。惟番回居大半”。^⑥在肃州城外有“回回墓墩”，“距城西一百六十里，在关西九十里，以有回回三大家，故命”。^⑦在肃州农村里还种植“回回大麦”，“昔无此种，由西夷（疑域误）带来，种之亦不甚多。形大而圆，色白茎穗，异于他麦，又名西大麦”。^⑧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它是回回商人等劳动者的定居生活与劳动生产分不开的。

元代大量的回回来到中国，因战争环境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只身前来，不可能携带家眷，他们在全国各地垦殖居留下来以后，为从事劳动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就成家立室。由于他们所居的地方多在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居住的地区之中，因而妻子也主要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女子。在甘肃留居的回回的婚姻也是这样，他们的子女自然也成为回

《多桑蒙古史》卷 3，第 5 章。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 172 页。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王礼：《麟原集》卷 6 《义冢记》。

⑤ 《甘肃通志稿·民族志》。

⑥⑦⑧ 《肃州府志》卷 3。

回的成员。这样甘肃回回又有了新的发展，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元政府曾将他们的一部分移往江南，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乙卯，蒙古主徙甘、肃、凉州（今武威）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被徙者户四百三十六，口一千四百七十九”。^①说明回回人在甘肃河西落居者已有相当规模，元政府对他们也持有戒心，便有意识的进行迁徙。《明史列传》中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甚多”。^②也说明了甘肃回回人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元政府为了控制在甘肃以及陕西（时陕西辖区包括今甘肃境内的陇东、陇右广大地区）等地的回回人，还在陕西诸道御史台设有回回掾史一人，专门处理与回回人有关的事宜。

到元末，文献记载，甘肃回回已有了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据考，天水西关后街清真寺，为元顺帝时所建。“清真寺，在西关城东北角。创自元至正间。其殿五楹，琉璃碧瓦，丹楹刻桷”。^③甘肃回回经过元代近百年的发展，从地域特点、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方面，已向一个民族的形成过渡。

三

明代是甘肃回回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时期。如果说唐、宋时期甘肃回族的“先民”和元代甘肃的回回人，多活动、定居于河西地区的话，那么到了明代，回回人已遍布甘肃各地，“甘肃在明代，几为回民全部区域，如河西各县，陇西、甘谷、靖远、景太、临洮，过去曾为回胞住居最多的地方”。^④此时甘肃回回人数的增长主要的还是自身的繁衍，其次为西域回回贡使和商人在甘肃的留居。明洪武年间，回回贡使和商人在甘肃者人数甚众，曾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太祖朱元璋下令禁止他们久留甘肃。“谕令西番回回来互市者，先是曾遣回回使西域诸国，留其家属居于西凉，逗留五年不还，其余回回居边土者又数劫掠，为边将所获。事闻，帝以回回使者朝贡往来，恐其因生边衅，命徙其扬州，既而复有愿洁家回本地者。帝始疑中觐我中国，至是命番使止甘、肃城外三十里，毋令入城，若朝贡之使欲入城者停”。^⑤明成祖朱棣时（1403—1424年）西域贡使和商人，从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进入河西走廊，沿甘肃而至关中，络绎不绝。他们不仅经商贸易，且有定居为农者，“先是永乐时，成祖欲远方，外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⑥此时，早在元代就落居于甘肃的回回，人口又有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下诏：“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诏令的本质，是防范回回力量的壮大，但在客观上为回汉通婚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回回人口的增长。甘肃回回在明代的大量增加，不能不说是与明政府的这种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的和新的成员接受伊斯兰教信仰有关。

《甘肃青史略》正编，卷13。

《明史列传》卷220。

《天水县志》。

竹篱：《回教在甘肃》，见《新甘肃》1947年2卷1期。

⑤ 《钦定续文献通考·市耀考》。

⑥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

此外，甘肃回回在明代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明政府的军事活动分不开的。如现在临潭（明为洮州卫）的回族，就是明初西平侯沐英西征吐番时带去的回回兵，“十二年春（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讨之”。^①至今当地回族群众中仍然流传着他们是从南方来的传说。这支回回兵后来有一部分留下戍边，逐渐成为当地的农户。为了适应这些回回兵的宗教生活，在当地修建了清真寺，“旧洮礼拜上寺，在旧城。明洪武……年创建”。^②从那以后，回回就在当地落户。并以善于经商闻名于西北。在明代，这里的商业就十分发达，“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③洮州也成为甘肃回回在明代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位于甘肃中部西南面的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明代以来，也成为回回人的聚居区，“回族亦自有明以后，日渐繁盛”。^④

回回人在甘肃境内的不断壮大与广泛聚居，使明政府甚为不安，连续采取了措施，强制性地进行了疏散。“洪武中，回回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特别是自唐、宋、元三朝以来，一直是穆斯林活动、定居的河西地区，更是明政府疏散的重点。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将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的回回一千七百四十九人，计四百三十六户，迁到江西各卫。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又将凉州回回二百零二人迁到浙江等地，“是回族不但徙居甘、肃、凉，且亦徙居江浙”。^⑤明政府虽尽全力，想通过强迫迁徙等手段，阻碍回回人的自身发展，但收效甚微。到了明末，回回人几乎遍及甘肃全境，“迄明末清初，西起瓜（今敦煌）、沙（今安西县以西），东起环庆（今庆阳一带），北抵银（今陕西榆林东南）、夏（今内蒙境内），南及洮（今临潭）、岷（今岷县），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⑦回回“先民”自唐代进入甘肃以来，不但人口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地域条件上也有了发展。

明代，甘肃回回的生活较之元代安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宗教活动场所的需求量也比元代更大，更普遍。因此，在全省各回回聚居区普遍建立了清真寺，见于文献和已考证确定是明代修建的清真寺，除了上面提到的临潭旧城上寺以外，还在徽县、兰州、河州等许多地区修建了清真寺，“（明）成化年，有何楚英、金客、马伦、马聪辈，关陕人也。以为礼拜无所，或失在褻陋。遂卜吉于（徽县）东郊三元宫左。金施金资，置而创立焉”。^⑧“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兰州城内修绣河沿大寺一座，是为兰州地区（仅指城关、七里河区）唯一的也是最早的清真寺”。^⑨“临夏八坊的格底目，于明成

《明史·太祖本纪》。

② 《洮州厅志》。

《洮州厅志》。

《续修导河县志》卷2。

⑤ 《明史》卷332《西域传》。

⑥ 《甘肃民族志》卷2，第16页。

⑦ 吴景敖：《清代河湟诸役纪要》见《新中华》1943年复刊。

⑧ 《秦州新志》。

⑨ 王立中：“解放前兰州清真寺述略”，见1983年第3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化年间（1465—1487年）在风林城西（现在的华寺街）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用各种彩色装饰而成，故名‘花寺’。”^①河州南关大寺等也多建于明代。其实不见于记载的清真寺为数更多，这在解放初期，全省各地有些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上，是有所体现的。

明代三百年中，甘肃的回回已具备了形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首先从地域环境上，甘肃回回此时才真正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②元代回回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点，是指全国而言的，在甘肃则不是这种情况。当时回回人在甘肃者，主要分布在肃、甘二州，也就是今天的河西地区，在省内其它各地，回回入“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并没有形成。只是到了明代，从河西到陇南各地，以及今天的临夏、甘南两个自治州境内，回回的地域特点才表现得明显、突出。

其次，甘肃回回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城镇回回善于经商的经济特点也基本形成。回回人在全省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不断建立了新的回回村。商业上，河州（今临夏）是当时甘、青交界处的商业中心；张家川、平凉等地是著名的回回皮毛业集散场所。至于从事长途贩运日用品、饮食业、鲜货业的，为数就更多了。

再次，随着各地清真寺的建立，回回内部的凝结力和共同心理状态，已经相当巩固。民族感情上“党护族类”，“行賫居送，千里不持粮”，已是普遍的现象。

最后，甘肃回回为了适应环境，交流思想和生产技术的经验，已普遍使用汉文汉语。阿拉伯、波斯等语言文字，主要用于宗教活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都是零碎的夹杂于汉语之中，而且比例非常小，不象元代以前占主要的成份。

四

清朝初期和中期，是甘肃回族在封建社会里的发展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里，甘肃回族“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③不但人口增加了，居住区域更扩大了，在农业、商业、手工业及文化等方面，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发展了。清同治以前，河西仍然是甘肃回族主要的聚居区，“凉州回族均驻东关，每有举行，必集议礼拜寺”。^④“肃州回族皆住东关，或策名仕版，或经营商务，安居乐业”。^⑤乾隆十二年（1747年）还将肃州的回族迁往新疆，“移肃州回民分驻哈密”。^⑥全省其它地方，包括现在青海和宁夏所管辖的部分地区，在同治年以前，也是回族的杂居和聚居区，“其群居之处，西路之甘（今张掖）、凉（今武威）、肃（今酒泉）；西宁之西，乐（今乐都）、互（今互助）、大（今大通）；南路之清水（今清水县）、徽县、秦州（今天水）；东路之平凉、固原（今属宁夏）、化平（宁夏泾源县）、海原（今属宁夏）；北路之宁夏所属（此处指甘肃省宁夏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221页。

〔明〕陆深：《溪山余话》。

③ 《平定关陇纪略》卷1。

⑤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

⑥ 《甘肃通志稿·民族志》。

府，下辖宁夏县、宁朔县、中卫县、平罗县、灵州、宁灵厅），皆与汉人错杂而居，而惟河州为最多，其种类亦最强”。^①清初，从康熙开始，还将一部分新疆维吾尔等族迁往甘肃定居。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迁吐鲁番维吾尔族五十户于肃州东关；雍正六年（1728年）迁新疆维吾尔族六百五十四人安插在安西；雍正十一年（1733年），迁吐鲁番维吾尔族九千二百余人于瓜州。^②这些维吾尔族后来也融合于回族之中。通过以上史料的引证，可以说明清同治以前甘肃回族分布和人口增加的基本情况。

从同治元年开始，在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前后坚持斗争达十一年，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这次起义首先在陕西渭南揭开序幕，继而先后形成了宁夏金积堡、甘肃河州、青海西宁、甘肃肃州等四个起义中心，到一八七三年肃州城被攻破，起义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后，甘肃乃至西北的回族分布状况有了重大的改变，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布局。

左宗棠采取“先剿后抚”、“剿抚兼施”的反动伎俩，镇压了西北回民起义后，对居住各地的回民进行了“涣其群，孤其势”，强制性地空前的大迁徙。把原先居住在八百里秦川、秦渠、唐徕渠两岸富饶之地的回民，尽悉迁往山区贫瘠处安身。左宗棠对整个回民的迁徙，有一个歧视性的策略，这就是：“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③从表面上看来，左宗棠对回民似乎还有些照顾，选择“水草不乏，川原相间”的地带安置。实际上他的本意是把回民迁往“荒绝无主，自成片段”，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山区，迁徙的结果也正是这样，象宁夏的固原、甘肃的张家川等贫穷山区，成为迁徙回民的主要地区。

先是把陕西的回民大部分迁到甘肃，“固原的陕回数千人，安顿在平凉的大岔沟一带；金积堡的陕西回一万余人，安顿在平凉的化平川一带；河州的陕回一万余人，安顿在平凉、会宁、静宁和安定等处；西宁的陕回二万余人，安顿在平凉、秦安和清水等处”。^④后以平凉一带“形势最要，不宜多居种人”为名，将近万名回民从平凉一带迁到“南北均阻高阜，岩壑环崎……亦前代安置降人之地”^⑤的化平川（今泾源）、还把一部分甘肃回民迁到固原，“迁甘回固原……而编管钤束之”。^⑥

河西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唐、宋时期穆斯林活动最频繁，元代回回人定居最多，明代回回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自这次回民起义失败后，河西的回民几乎死散殆尽。左宗棠率部攻克肃州城后，“中军号炮三响毕，金顺、宋庆、徐占彪、刘锦棠，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除。是夜，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口外，尽付焚如，肃州以平。二十四日，安肃道史念祖，署肃州知州李宋笏入城，**鬲**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⑦后又把

① 《甘宁青史略》副编，卷3。

见《肃州新志》、《甘肃通志稿·民族志》。

② 《左文襄公全集》卷41。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7页。

③ 《清史稿·左宗棠传》。

④ 《左文襄公全集》卷38。

⑤ 《回民起义》N，第3页。

死中逃生的二千多回民，迁徙到金县（今榆中县）安插，“其时，甘州和凉州的回民，早已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再把肃州的回民搬走，可说河西就没有一个回民”。^①河西地区从此结束了历经唐、宋、元、明四朝，一直是甘肃穆斯林最集中地区的历史，出现了“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族聚处”^②的局面。以后虽然几经变迁，但河西地区再也没有形成回族聚居区。

与河西的情况不同的是，河州在同治以后，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西北四个回民反清中心中，金积堡、西宁、肃州均相继遭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回民横遭涂炭。唯有河州由于主要领导人马占鳌，在太子寺（今广河）战斗重创清军获胜后，意外地投降了左宗棠，没有受到损失，自明代以来“回多汉少”的局面仍然存在。各地回民起义失败后，又有大量的回民避难于河州，使河州的回族人口不断增加。“同治元年变乱，陕回多避居其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固原东西山相继平定，所有各处倡乱之回，亦多寄孳其间，以避诛戮”。还有些汉族因避战祸，也改信了回族，“其本籍汉民……，名为随教以图保全者”。左宗棠在镇压了各地回民起义后，曾想把河州的客回迁徙各地安插，但未能奏效，绝大部分仍然在河州居住。仅河州回族集聚的八方（今临夏市南面）一带，就有数万回族，“盖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③随着河州回族人口的增加，经堂教育发展很快，宗教职业者为数亦甚多，清真寺重建和新建的达一千余座。因而，同治以后，河州被人们称为“中国小麦加”。

王静斋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一文中这样写道：“（临夏）为西北回教文化中心。该处有十坊。每届开斋节，同到郊外举行礼拜。素有小‘麦加’之称。^④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对四川及西北数省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考察旅行，撰写了享有盛誉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其中对河州回族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载：“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回人听到河州，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的老家，是他们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种运动的策源地。”河州回族自治年以后的繁盛和影响，确为甘肃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平凉、张家川由于陕西回回的大量迁入，也成为同治以后甘肃回族的主要聚居区，“甘肃回族极繁……其在平凉、化平、固原、海原，张家川一带，为同治乱后安插之陕回”。^⑤甘肃回族的分布，自同治后再无多大变化，延续到一九四九年。

解放以后，在回族聚居的临夏和张家川，分别成立了回族自治州和回族自治县，平凉也即将成立回族自治县。甘肃回族人民在新中国的怀抱里，开始了历史新的一页。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8页。

《清史列传·左宗棠》。

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4页。

④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31。

⑤ 《回教论坛》1939年2卷。

⑥ 《甘宁青史略》副编，卷3。

河南回族来源和迁徙

马 达 陈廷良 王惠民

河南回族的来源

河南回族的来源，同于全国，也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洛阳是唐代的东部，五代时的京都在河南的开封、洛阳，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元代“……回回以中原为家”，在回族来源上理应留下不少记载，为回族的来源和形成提供有力的旁证。但由于年代久远，事实湮没，文字记载很少，我们只能从一些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文字资料、历史传说和某些迹象来探讨河南回族的来源。

（一）唐宋时期

“回回降妖”和“郭子仪搬兵”之说。我们在调查中，谈到回族来源时，上年纪的人都从“唐王做梦”、“回回降妖”和“郭子仪搬兵”说起。“唐王做梦”和“回回降妖”之说恐系子虚乌有，不足为凭。郭子仪搬兵平定安禄山之事流传较广，主要情节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兵叛，连陷东西两京，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应中国皇帝之请，派遣军队到中国来，帮助唐朝王室平定内乱，收复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许多人认为，战争结束后有些阿拉伯军队留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的后裔有些迁居河南，故有搬兵之说的广泛流传。

洛阳在唐代地位非常重要。唐灭隋，统一全国，以长安和洛阳并称东西两京为基地。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唐昭宗、唐哀宗等都曾长期都居洛阳。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执政期间，对洛阳进行了扩建，人口增至一百余万，经济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远超过前代。这里交通发达，由陆路向西可经陕西、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水路可至扬州、广州，进而远航直达阿拉伯。当时各国使者、学者、留学生、宗教人士、商人等都来到洛阳，加强了中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使之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都市之一。近年来，在唐墓和遗址中出土的波斯金、银货币和其他外币，证实当时在洛阳国内外客商云集，是国际性的贸易都市。史书上有蕃客在长安落户之记载，蕃客在洛阳落户也是可能的。

北宋人编著的《太平广记》卷四〇二《李勉》条载：“司徒李勉，开元（713—741年）初作尉浚仪（今开封西北）。秩满、公汴将游广陵（今扬州市）。行至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忽有波斯胡老疾，策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今扬州

市)愿托仁萌。勉哀之,因命登舡,仍给馐粥,胡人极怀惭愧,因云:‘我本王贵族也,商贩于此,已愈二十年,家有三子,必有求吾来者。’,……”另《太平广记》卷二十八《郗鉴》条,摘牛肃《纪闻》中所纪,在天宝五年(746年)见到“胡商”在开封卖药。上列事实可以看到胡商有到河南跑行商的,当也会有人象居住扬州那样,长河南长住下去,出现“土生蕃客。”

唐朝颍川(今在河南中部)人陈黯作《华心说》,收入《全唐文》之中,内载:唐宣宗大中初年(847年)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范阳公卢钧,把阿拉伯人李彦升推荐给朝廷。大中二年(848年)经过考试,李彦升高中进士(这一科共录取二十二名进士)。这个李彦升有可能是定居大梁(开封)的阿拉伯人。

北宋都城开封有二十多万户,约百万人口,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昼夜都可进行商业活动。宋末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都是宋代开封经济繁荣的写照。开封交通四通八达。当时,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泛海经由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到开封。还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其它地区的穆斯林仍从陆上沿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到罗布泊附近。因河西走廊为西夏所占据,他们要去宋朝进行外交、贸易等活动,就折向东南入柴达木盆地,经青海湖北岸,过西宁,沿湟水各地到洮河流域,走临洮,再由陇南进入关中平原,过洛阳,到开封。宋朝和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国家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宋会要稿》蕃夷四、蕃夷七,《玉海》,《宋史·大食传》等书记载,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至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一百四十八年时间,仅大食人(阿拉伯人)就朝贡四十六次,平均三年多一点就有一次。宋朝王室和官吏为满足奢侈腐化之需要,进口大量物品,尤其是香料、药物、象牙、犀角和珠玉等,仅香料一项数字就很惊人。蕃客来京城做生意,可以想见。《宋会要稿》职官回回载:“今来大食诸国蕃客,乞往诸洲及东京买卖。”开封历史上记载确有蕃客之属的犹太人定居,他们自称“青回回”,那么同是蕃客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穆斯林也会在开封和河南的其他地方定居。

宋王朝和阿拉伯,波斯等地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是友好的,对前来贸易和定居的穆斯林采取友好态度。《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抚滇(云南)功绩》中说:穆哈默德二十六世孙,中亚布哈拉教主苏菲尔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同弟艾尔沙、三子五孙家属,率部下五千三百余人,驼马五千余骑,入贡京师。神宗大悦,授公为本部正使总管。马注《清真指南》卷一《请褒表》中说:宋熙宁时(1068—1077年)时,臣祖所菲尔为阿思补哈喇国王,入贡京师。神宗大悦,留住淮、泗之间,封宁西域朝奉王。江苏省伊协的梁全智同志讲:他们的家谱序言中记载:他家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从西域古教之地来到开封,做金疮科御医,二代后转入地方,成为开业医生,堂号滋德堂。第一代始祖,皇帝赐姓梁,名柱,传至第九代,家族人丁兴旺,维持生活困难,梁继六率本支人口到南京定居。沁阳县北鲁村王明经(七十七岁)讲:口传我村穆斯林是宋朝时从西安迁移来的。

白寿彝先生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载于《中国伊斯兰史存稿》P:171)中说:蒙古西征前,回教人之在中国者,虽间有赴内地贸易之事,但其集合及长期居留中心,仍限于京师及通商口岸。

从上事例中说明，唐宋时期，河南也确有“蕃客”前来定居，这些定居在河南的阿拉伯、波斯等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和其他人的后裔，就成为河南回族来源的一小部分。

（二）元朝时期

随着蒙古军西征的胜利，不断扩充军队，把大量的回回军士编为“探马赤军”和蒙古军队一同征战，然后在各个要地驻防“屯田”，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有的回回人成为屯田的农人和各专业工匠。逐渐在各地居住下来，形成“今回回以中原为家”。

据《孟县志·职官志》元朝部分记载：曷思麦里带领探马赤军屯驻在怀孟州。又记载：“阿里中统间（1260—1264）宣差孟州达鲁花亦”。《河内县志·职官志》有中统间虎兼任怀州达鲁花亦之记载。并记载怀孟修筑水利之事。可见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便于灌溉，向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怀孟州是回回屯田之所在。阳沁县北大寺，万历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记》认为“我怀有清真寺唐矣，或云溯于元至正间（1341—1368年）。”这也是屯田的一个旁证。

从淮阳到沈丘一带，是名叫阿里的人率穆斯林到此屯田。沈丘县槐店镇老清真寺（已毁）有一块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年）的建寺碑证实此事。

《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立南阳屯田总府……。屯田一万零六百六十二顷七亩。”回回军士和妇孺被编入社屯田，有的是聚居，有的是同汉族杂居。聚居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为回族聚居村庄。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南阳县尚存六十一屯，其中石桥屯、瓦店屯、玉池陂（即黄池陂）等十二屯，至今还是回族聚居之地。明朝建文帝时曾任兵部尚书的铁铉，就是元朝驻邓县回回人的后裔。

固始县（原汝宁府光州固始县）东关有一街名叫《方井口沿》，相传是元初派来的两支小部队，各有二百多人，在此扎东西两座营盘，为吃水方便，在两营之间挖一井，上安一个整块石头凿的方井口，为了不使污水流入，井口上起台，这符合信仰伊斯兰教人的习惯做法。两营共用此井，以后逐渐以两营为中心建立固始县城的东西两座清真寺。此方井口至今还在，四角有八条绳磨的印子，说明使用很久，可井水仍十分旺盛，还是附近回族人民吃水的主要水源。

据固始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寿同志讲：他家的家谱（已毁）序言记载，陈姓原系安徽徽州人，元朝时祖上在安徽做学政官员，与马祖常家联姻，元朝中期迁潢川县小南海（现名回回营），后潢河发大水淹潢川城，兄弟二人为生活而分居，一留潢川县，一迁固始县至今。固始一支世代与潢川马姓联姻，陈寿同的母亲今年86岁也是潢川马姓。陈姓祖上对古兰经很有研究，有关著作已遗失。

据潢川县马明远先生（今年73岁）讲：他是马祖常第二十七代孙，他们在元代即定居潢川县小南海。马祖常原是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其后代成为回族。这也是维吾尔族有的人融合于回族之中的一个例证。

《元史》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令“括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悉令

南京（开封）屯田。”造炮专家、宣武将军、管军总管阿老瓦丁率炮兵进驻开封附近。

《元史·兵志工》记“河洛、山东居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回回人是探马赤军的主力，他们驻防屯田在开封、洛阳、许昌和商丘一带。现在我省地名：回回寨、回回营、回回凹、教门街的，可能就是元代回回人屯田的地方。

元朝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称：“哈只之孙凯霖葬其祖考妣、考妣、兄嫂弟侄于安阳。”这也说明当时安阳有回回人居住。

综上所述，我省现在十七个县、市中，绝大部分在元朝时都有回回聚居或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可以说是“今回回人以中原为家”了。

蔡美彪先生辑《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共收九十四块白话碑，其中五十三块圣旨碑是关于保护各个宗教，内有十九块碑文中带有“答失蛮”字样，河南立有五块，分别在彰德（安阳）、林县、辉县、许州（许昌市）等处的道教宫观中。这也是“今回回以中原为家”的一个佐证。

（三）元末明初时期

在回回人发展形成成为回回民族的过程中，大量的汉族人通过通婚、改变信仰而逐渐融合到回族中来。此种事例各处可见。

二、河南回族的迁徙与分布

在元朝回回人分布的基础上，经过历朝历代的迁徙，使回族人遍布我省全部市、县，重要乡镇和水旱码头。

（一）明朝的迁徙与分布

元朝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日益苛重的盘剥压榨，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逐渐趋于激化。1325年河南息州首先爆发了赵丑厮、郭菩萨起义。1337年陈州棒胡起义。1351年红巾军起义，攻到息州、光州。1357年红巾军攻占开封，并以此为都。同时，布王三的“北琐红军”占据了：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等府、州、县。而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王宝宝、河南罗山的李思齐则是镇压农民起义军最凶恶的两支地主武装。因此，河南成为元末农民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人民死伤惨重，赤地千里。回族同胞同样卷入农民战争的漩涡之中，这种局面，引起明初河南居民包括回族的大迁徙和重新分布。

明初迁徙的主要原因：

1. 明初向地广人稀之处强迫移民。

河南部分群众流传老家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底下之说。洪洞县的《大槐树志》中记载：这里曾是一个移民转运站，凡被迁移的人不管原籍是哪里的，籍贯一律改为洪洞县，回族也是一样，所以回族中也流传老家是洪洞县枣营、石榴园之说。回族与枣和石榴关系密切，为与汉族相区别，在洪洞县之后特别加上枣营和石榴园。

在明初向河南的强迫移民中，有回族人，这从几家大姓中可以证实。如孟县桑坡村

丁姓，除河南外，还分布到十几个省，甚至在国外也有。其始祖丁贵，即洪武年间来自洪洞县。禹县山货回族乡赵姓，始祖赵来杰，赵来义是从洪洞县来的，怀庆府河内县（沁阳、博爱）的闪姓，相传从洪洞县迁来弟兄三人：闪江、闪海、闪河，分居三个村镇，传数百年而辈不乱。丁姓有宗谱，赵姓有墓碑，博爱县闪拐村还保存有明万历年间的闪姓碑。兰玉的后代迁邓县城兰营。

2. 逃亡、隐居而迁来。

明初政治斗争激烈，朱元璋执政时搞了胡案、兰案两大冤狱，一些文武官员逃到河南避难。兰党钱姓因遭受迫害而隐官睢县东关，直到清朝才考取功名。明成祖朱棣夺取建文帝皇位后，有的人因抗拒过朱棣而成为钦犯，隐居外地，如：睢县刘姓，据宗谱序含上讲，刘姓祖居南京，后迁北京，继迁沧洲，最后落到睢县，其始祖刘彦是洪武时的锦衣卫指挥军使，后率子孙来睢县。睢县另一大姓吴姓，与刘姓是表兄弟，他们先后到睢县。

3. 因经商而移居河南

经商是回族传统的行业，他们无地或少地为生活而飘泊不定，不断迁徙。如济源县袁姓，族谱上写系北京香椿胡同人，因经商而迁居开封东大街，再迁沁阳水南关，最后落脚到济源庙街镇下街。又如镇平县水姓，经商由陕西省渭南良天坡迁居镇平县东柳泉铺北水沟村。

明朝河南回族分布于元朝，明朝即有清真寺的大致有：开封、郑州、洛阳、焦作、孟县、沁阳、博爱、武陟、辉县、封丘、荥阳、偃师、洛宁、卢氏、许昌、长葛、临颖、禹县、襄城、南阳、邓县、新野、镇平、南召、信阳、潢川、固始、新蔡、汝南、西平、兰考、杞县、民权、宁陵、商丘、夏邑、太康、淮阳、沈丘、项城等地。基本上遍布全省。

根据上述情况看，是先有回族定居，而后建立规模较小的清真寺，随着人口的繁衍、经济收入的提高回民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小的聚居区逐渐形成清真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现存有明朝石碑的清真寺如：开封市东大寺、文书寺、博爱县二仙庙清真寺，沁阳县自治街北大寺等等。有旁证可查的明朝时即创建的清真寺如：郑州北大寺、朱仙镇北大寺、洛阳北窟清真寺、焦作造店清真寺、博爱县西关清真寺、大新庄清真东寺、沁阳县水南关清真寺、孟县桑坡清真寺、商丘清真寺、禹县清真寺、山货乡清真寺、潢川清真寺、汝南清真寺、南阳河街清真寺等等。这些清真寺周围都有上千以至五千以上的回族人聚居。总之，凡黄河、淮河流域，东西南北陆路通道上的水旱码头，基本上都有回族居住，从事商业、手工业、饮食业或务农。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回族人民在迁徙中多是生活贫困，到一个新居住地点，先是经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或饮食业，生活富裕后才拥有土地。如禹县山货场村的丁姓在清初已迁徙此地，到乾隆四十五年还没有土地，在清真寺的石碑中可以得证明。

由于明末的战乱，使回族又一次大迁徙，在全省的分布更加广泛。

从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北部彰德（今安阳）、卫辉（今汲县）、怀庆（今沁阳）三府后，在此与明军进行战斗，以后进入黄河南，加上河南连年灾荒，人们纷纷参加起义军。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率五十骑人马进入河南，崇

祯十四年起义军猛增到五十万人，崇祯十五年时号称百万之众，与明朝军队在新蔡、襄城、朱仙镇、郟县等地进行大的决战。老回回马宋应也在河南转战数年。河南战事一直持续到1645年，十几年的战争，加上连年灾荒，使人口大减。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回族人民也分成两个阵营。一是反对起义军，如陈州城内部分回族人在阿衡率领下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对抗，城破杀者不少，清真寺也被焚烧。一是参加起义军，如济源县袁氏族谱记载：袁氏始祖袁忠义在沁阳县水南关居住时，“二兄俱流贼掠去，莫知所终”。咸丰年间修的家谱，不敢赞扬起义军，这种写法是参加起义军的隐语。

战后，河南赤地千里，人烟稀少，野兽出没，以至发生南阳野狗吃活人之事，所以又一次引起居民大迁徙，回族当然也不例外。

（二）清朝时期的迁徙与分布

清朝河南回族人大迁徙，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由外省迁入河南，又可分为几种类型。

1. 起义军人员及其后裔迁居河南。

明末农民起义军老回回马守应部下有定居在河南南部和东部的。有些马姓自称是明末起义军的后裔。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失败后，有不少陕西人逃到河南各地定居，如开封的吴姓是从清军的虎口中逃出来的。

2. 由经商而定居河南

河南各大城镇都有因经商而定居下来的回回后裔，如开封马予兴桶子鸡铺的马家来自金陵（南京）。开封牲口市一带“马客伙”中的白、吴、苏、马等姓来自陕西。此外，还有许多族始来自京京、天津、沧州、真定、大名、保定、山东、甘肃、安徽等地。山东省济宁市和沙马海地方的皮毛业、皮革业很有名，不少当地手工业者移居河南各地经营皮毛业和皮革业。

3. 当阿衡而定居河南的。

清朝康熙年间，湖南源陵县著名经学大师舍起灵（字蕴善、号云山），定居在襄城县石羊街，至今已传十二代人。有书认为舍起灵是陕西人、山西人或河北中山人，笔者认为缺乏根据，以后将专文论述。来河南当阿衡而定居的，还有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陈西、甘肃等地人。

另外，由于饥荒、统治阶级的压榨、经商、做官、如阿衡和充军发配等原因。也有不少河南回族人到外省定居。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孟县桑坡回族人，他们为生活所迫，带着塾皮毛的技艺，流散到约半个中国。在甘肃平凉市，由于桑坡人迁来的日多自成村落，人称为西桑坡或新桑坡。

再一种情况，是河南省内部的迁徙。开封城内人、朱仙镇人、洛阳人、孟县桑坡人、荥阳县的海姓、封丘县的李姓、周口、淮阳一带人等等，他们为谋生纷纷迁到全省各地。

通过清朝时期的大迁徙，使河南省绝大部分县城、重要乡镇、水旱码头都遍布回族人民，这由六、七百座清真寺的建立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3. 辛亥革命后河南回族人民的迁徙和分布。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族经济的发展使河南回族人民又有迁徙，有的民族资本家或者皮毛商人向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兰州等地迁徙，也有外省人向河南迁徙。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人们，大批逃到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地。孟县桑坡村人口由光绪年间的一万多人，下降到解放前的九百多人。

建国后，河南回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又有大批人到西北各省去支援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因此在西北的重要城镇，都可以找到河南人。

建国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回族中有大量人成为国家干部和职工，在省内外调动，也有外省、市回族人员调入河南省，使向无回族人定居的林县、光山县、新县等县也有少量回族定居，现在省内各地、市、县都有回族人居住。

结 束 语

河南省回族人民在历史上不断迁徙，旧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生活贫困，平日生活即倍受艰辛，遇到饥荒和战乱，只有外出谋生，背井离乡成为常事。无地和少地的人们，集聚到水旱码头当脚夫、搬运工或干饮食业，又随着交通线的变更再度转移。生活不安定，能勉强糊口，已成军事，经济、文化水平不可能提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建立民族区、乡、镇组织，配备大量回族干部，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事业，才使回族人民在生活上安定下来，三中全会以及、由于大力发展生产放宽政策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在民族大家庭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汉族兄弟及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